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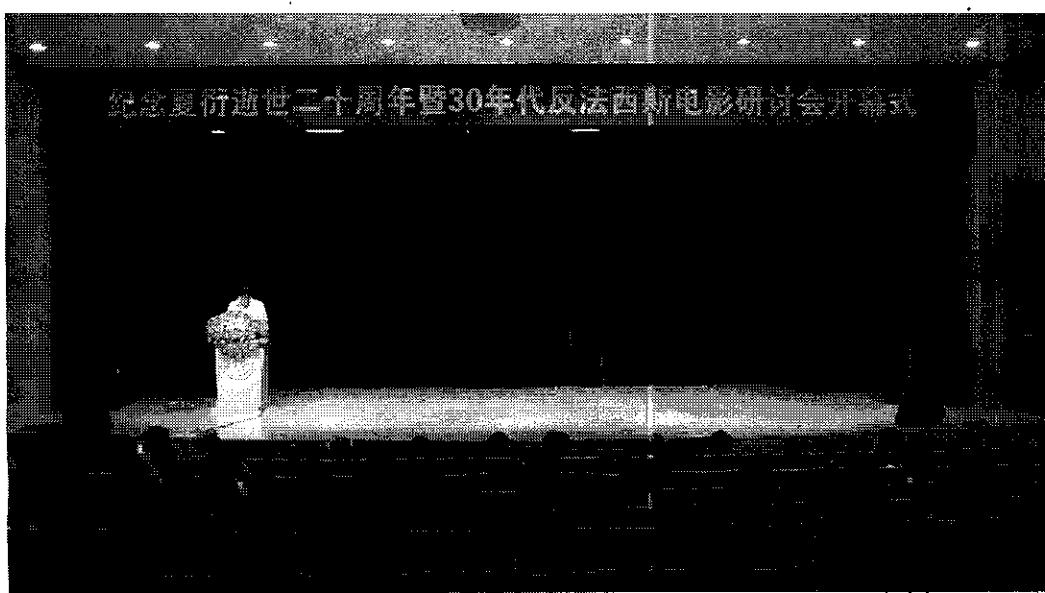
可见的左翼 不灭的精神

夏衍逝世二十周年暨30年代反法西斯电影研讨会举行

■文/本报记者 赵丽 实习记者 张恺鑫 杨立群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夏衍逝世20周年。在这个充满厚重历史记忆与鲜明时代精神的年份,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缅怀夏公及同时代的左翼文化人、电影人,继承和发扬中国近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伟大精神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代电影》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可见的左翼:纪念夏衍逝世二十周年暨30年代反法西斯电影研讨会”于7月18日、1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在致辞中表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人不仅在近代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救亡运动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领导作用,他们留下的左翼电影等文艺作品也是我们民族不可估量的精神遗产。缅怀以夏衍为代表的一代左翼电影人,体会那一代左翼文化人深刻的精神创造是当今中华学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具有深广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樊国宾、《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航、浙江省文学学会会长陈坚、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张建勇、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等来自各高校、研究机构、报社和出版社的近百名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张建勇在研讨会致辞

缅怀夏公的一生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夏衍同志做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加强党组织对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在电影论争中推进左翼影评,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影剧创作,一生创作电影剧本20多部,是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先驱。

黄会林饱含深情地回顾了夏衍对她的教导,认为夏衍“一生兢兢业业,提携后进,晚年把自己仅有的极其宝贵的一线光明无私地捐赠给了青年后辈”。她同时指出,“70年前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人以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振奋的人道主义精神挺身而出,7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扛过前辈们的大旗,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建立除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强盛的第三极文化”。

沈旦华站在亲人的角度详尽勾勒了夏衍的多重人格。夏衍一生好学,在日本留学期间迅速掌握日、德、英三门外语,扎根图书馆博览群书,吸收大量新知识新观念,甚至在文革狱中仍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夏衍爱惜人才,尊重青年才俊,帮助赵季康细致修改《五朵金花》却不署名。夏公更可贵的品质是乐观豁达、从不记仇,文革中屡次被批斗的他形容自己“是庙里的一口钟,隔一段时间就要敲敲打打”,批斗他的“老冤家”

过世,他还亲自出席追悼会。

张建勇总结回顾了夏衍波澜壮阔的一生,夏衍从青少年时期便积极参加革命,1927年他无惧“白色恐怖”,毅然从日本回国加入共产党,于1930年协助鲁迅成立左联,后又带领一大批左翼影人创建和发展进步电影。上海解放后夏衍参加了电影事业的创建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电影迎来第一个艺术创作高峰,涌现出一大批艺术精品。文革后夏衍以病残之躯四处奔走,为党在新时期的文艺、外交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他指出,夏衍是一座伟大的丰碑,一面光辉的旗帜,后辈学人应当继承和发扬先生的遗志,为创造中国当代进步文化而紧密合作、努力奋斗。

左翼电影研究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人、电影人的领军人物,夏衍及同仁不仅将反法西斯的阵地扩展到新兴的电影领域,同时开拓了电影的精神和艺术深度,使30年代左翼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议的一座丰碑。

本次论坛讨论的“中国左翼电影”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激烈政治和左翼社会思潮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进步人士,协同摄制的一批宣扬反帝反封建的影片,具有反映大众疾苦、倡导社会公正、追求时代进步的特点,学

者们围绕它阐述了不同观点。

根据杨菊教授的意见,这种左翼电影的核心价值在于传达出阶级意识、革命意识、民族意识这三种意识,把阶级意识与观众习惯的道德判断相结合,从而争取中国当时的文化领导权。

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对于都市大众进行阶级意识的规训,使都市大众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无产阶级必定能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权,以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小资产阶级最终要没落的历史命运等等。简单来说,左翼电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程的其中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孙柏提出,新中国革命战争题材电影对汉奸、叛徒和特务的再现更加复杂,提示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信息,像是性别修辞和阶级划分都是在“内部的敌人”刻画中的重要元素。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叛徒、翻译官和女特务的银幕形象服务于为群众政治文化提供社会甄别与对敌斗争的想象投射。然而,由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以及革命叙述自身的结构性悖论,这些“内部的敌人”形象也集中呈现出某种情感矛盾和再现难题。

徐文明分析与梳理了1931年至1945年中国电影广告的表现与责任担当,例如故事片和纪录片等影片的广告文案和影片内容传播中的国族意识唤起,沦陷时期中国

电影广告呈现的文化之痛等等。通过回顾这一历史时期,可以得知中国电影广告伴随着中国电影,一起向公众传递了抗日爱国、保家卫国等思想,成为展现中国社会人的精神气质和国家民族命运的窗口,亦为世界认识早期中国电影及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值得重视和珍视的文化记忆。

范志忠从左翼影人对《火烧红莲寺》等历史片的批评谈起,认为历史题材影片展现出传统的中华历史在与工业文明对接时的宽泛姿态,人们大张旗鼓地鞭答具有娱乐性的历史题材影片,努力倡导以启蒙为使命的现实题材新生电影,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一定局限。这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电影的创作。

反法西斯电影

从中国左翼电影引申开来,世界反法西斯电影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刘小枫从幼年的观影经验出发,谈到了《地道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夜间守门人》等不同风貌的反法西斯电影。他认为左翼和右翼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地道战》等经典电影属于反法西斯电影中“左”的电影,新时期以来涌现的《夜间守门人》则是“右”的电影。反法西斯电影表现了战争状态下人的特殊境遇,影响着人们审视历史的态度,近年来反法西斯电影中的“右翼”电影大放异彩,“左”的不可见值得我们警惕。

吴海勇指出,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日本早就开始摄制辱华影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记者和摄影师,拍摄纪录片,第一时间将最新战报和片子用

飞机送回日本,强化了满洲是日本国防第一线的思想灌输,大长了日本国民的好战气焰。在“日政府厉行电影外交,实践电影政治化、电影宣传化、电影军事化”的情况下,中国反法西斯电影的崛起是在电影艺术及宣传阵线上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气焰与舆论的重要武器。

中日的“电影战”实质上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民族意识的交锋。中国左翼电影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宣传阵线中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作用;同时,日本实施的“电影战”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新兴的时代背景,激发了左翼电影的战斗力量。

中日电影战以外,香港也有着同样的反法西斯电影阵线。赵卫防提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在主题上虽叠合在内地电影文化的发展之中,但内地电影在30年代形成的左翼电影文化对香港波及不大;香港影坛虽然充斥着浓郁的教化意识,但那种充满着揭露、批判等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左翼电影并没有明显地呈现。然而,在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香港影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开始拍摄抗战题材的电影,左翼文化也才随之展露。其后,香港电影逐渐地接受了中国左翼电影文化,进步的左翼电影成为香港电影历史的一部分,这也为后来的香港进步电影作了必要的铺垫。

戴锦华总结道,夏衍研究,左翼电影和反法西斯战争等主题作为一组相关的坐标,标示出了一个交汇点,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意象和问题,“这与迅速崛起中的中国和中国电影之间形成了一个至少对我们来说一厢情愿的对话关系,对今天的电影治史和中国电影的批评建设有重要意义。”



黄会林、李道新等知名学者参加研讨